

自序：“五四”过后是延安

朱鸿召

我们早已关注“五四”，我们刚开始关注延安。

从“五四”到延安，~~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河流拐了一个弯。

十年延安时期（~~1935-1945~~），不仅规范制约了此后半个多世纪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死浮沉与歌哭，而且重新阐释了此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重新规划了中国古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还重新描述了世界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

员

立于又一个新世纪之初，回顾刚刚成为过去，还带着我们父辈、祖父辈体温的 ~~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具有思想文化史价值意义的时代，只有“五四”和延安。“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20~~世纪中国的历史因此而溶入我们的血脉，凝结着我们父辈、祖父辈的泪水、汗水和血水，吸纳了我们几代人发自心灵深处的风声、雨声、咆哮声、厮杀声、欢笑声……

这种人，就是近现代中国读书人，现在通称的知识分子。

发现人，是寻找历史遗嘱的执行人。经历过 ~~19~~世纪后半叶中西方商贸、炮火和文化的交流来往，中华民族危亡日渐加重，历史的遗嘱在等待执行。清末一系列新政运动，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但被一再拖延，最后胎死腹中的政治变革，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武装斗争、军阀政治。旧秩序已经破坏，新秩序还没有形成，科举制度废除，斩断了中国读书人与原有社会政治体制的必然联系，他们成为一群飘忽不定的自由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进化论旗帜下，寻找到已经接受或正在接受西方新文化思想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作为引领时代发展方向，担当思想解放、文化解放，创造新人生、创造新社会的

历史遗嘱执行人。

尽管脐带斩断，血脉相通，这些新式知识分子骨子里流淌着浓厚的传统中国文化习性。但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已经具备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铮铮傲骨，“大胆地设想，小心地求证”的科学态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浩然情怀。他们在“五四”之后，担当道义，抗争强权，呵护天下良知和黎民百姓。

改造人，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经历过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进入革命队伍里的新知识分子，率先接受洗心革面的人生改造。在阶级论思想指引下，无论你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必须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是此后几代中国读书人唯一可走的人生道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发现了人而创造了 20 世纪前半叶历史，延安时期因为改造了人而创造了 20 世纪后半叶历史。并且，因为改造人，重新塑造人，延安改写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这是怎样一段惊涛拍岸、波浪滔天的河湾呀！

本书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就延安时期的某些历史关键问题或趣味敏感话题，作溯流探源与疏浚流程的工作，借以考察改造、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集体生活规则，探讨制约、规范我们几代人思维言说习惯的集体记忆法则。

延安十年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当代性，远远超出了“五四”。我相信，清理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遗产绕不过延安，建设 21 世纪中国社会文明进程同样绕不过延安。我希望，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人都关注延安、思索延安，以此作为我们今天选择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的逻辑起点。

盼望呼应，期待批评。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zhangyong@china.com.cn

2006 年 缘月改定

延安生活指数

延安十年(1935—1945),将一个陕北小镇打造成革命圣地,并因此而规范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改写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篇章。走进历史的生活是崇高的,但融入生活里的历史却往往是繁杂琐碎的。

一摇人口与性别

猿

人,创造了人间的奇迹 同样是人,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战争年代和医疗卫生条件极不发达的地区,人是一切资源中最可利用的因素,也是最可宝贵的因素。延安,自古就是边陲要塞,位于汉族与匈



宝塔山下,延安曾让世界为之瞩目

奴等北方少数民族交流杂处的前沿地带。清末以后,这里战争频仍,十室九空。1935年 10 月,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到达陕北后,当务之急就是“扩红”——招募青壮年人口参加红军,补充长途跋涉而锐减了的部队编制和战斗力。此后的十余年间,陕北延安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大量吸引人才,更大

量地招募移民人口。革命圣地延安的历史,就是由他们直接参与打造的。

1937年11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延安。当时,延安城本地居民大约 1.5万人。“在露天集市上,农民和商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还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气的饭馆,仍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呈现着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而此时部署在延安的共产党守备部队实有兵力总计 1.5万人,共分为 15个团。1938—1945年边区与国民党军队开始发生摩擦,从前线撤下 1.5个团来加强守备部队,使其兵力增加到 2.5万人。^①

源



1937年的肤施古城,依山傍水,气势巍峨,依然保存着作为古代军事要塞的庄严气象

1935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的实有人数是 2.5万人,战斗部队编制为 15个军团。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带有大约可以用两个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食盐。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剩下 2.5万人,其中正规部队战士约 1.5万人。

1937年11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将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陕

^① [德]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0年11月版,第 100页。

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共源万人,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抗日。在延安的各师留守部队组成“八路军留守兵团”,总人数是员万人。同年怨月,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八路军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集团军”。稍后,八路军留守兵团与第一二〇师等部队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员年缘月,在延安的党政干部有员万人,陕甘宁边区民众人口约员万,军队约员万人。^①

员年愿月,在延安的党政军人数有猿万人,老百姓约员万人。^②这相当于员年延安市区人口的员倍。

员年员月员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就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发言,其中介绍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源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员,高中占圆,初中占猿,初中以下约猿。这些知识分子到延安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就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或其他根据地工作,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

员年员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提供的确切统计资料显示,延安市区老百姓人口总数为员万人,陕甘宁边区人口总数为员万人。这是不包括党政军学等“公家人”的。同时,据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统计,员-员年间,边区共接受移民达万户,人口圆万。外加缘多人的还乡难民,人口总迁移量达到猿万人。安定县(今子长县)四个行政村原来只有员户,到员年短短几年时间就增加到圆户。^③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先进模范村的延川县刘家河村,员年只有缘户人家,还口人,到员年就增加到圆户人家,员口人。^④在这十年里,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在缘-圆之间,属于典型的非自然增长状况。在员年的边区农村总人口中,全劳力就高达猿万人。这种以移民为主

缘

① 参见唯木:《当前的剧运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解放日报》(延安)员年缘月员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员年愿月员日,中央档案馆存。

③ 《边区人民生活日趋改善》,《解放日报》(延安)员年怨月员日。

④ 《刘家河村被誉为丰衣足食模范村》,《解放日报》(延安)员年怨月员日。

体的人口迅速增长,为农业生产和兵力补充提供了可靠有力的保障。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其边区人口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发展生产,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反对堕胎,加速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力吸收各类人才,大量招揽各种移民,增加人口。1944年10月10日的《解放日报》载文说:“我们不怕来的人多,愈多愈好,我们只怪历史上给延安县遗留的人口太少,给我们发展生产许多困难。假如在二三年后,延安人口达到十万以上,那我们的工作将是另一番现象。”

上述边区人口中,农村老百姓无论是原有农民,还是招揽来的移民,其男女性别比例大体上是平衡的。1944年10月边区选举委员会统计的边区人口总数中,男性100万人,女性100万人,男女性别比为1:1,属于正常状态。可是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中,男女比例却严重失调。

1944年前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男女比例为1:1.5。几年过后,到1945年前后,男女比例稍有缓解,为1:1.2。再过几年,情况更向好的方向发展,1946年10月,男女比例为1:1.1^①。这个比例关系基本维持到1947年开始逐渐撤离延安。

形成这种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关系的原因,是长征到陕北延安的革命队伍,绝大部分都是男人。一大批青年学生为了抗战,从沦陷区、国统区和大后方奔赴延安,献身革命,才缓解了革命队伍里严重倾斜着的男女性别比例关系。“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愿意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②

1945年10月,时年18岁的孙承勋(何满子)经武汉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高级班第六队学习。此前在武汉抗日救亡活动中,他认识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学生郭维琮,同样也到延安,进入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他们之间保持着亲密的通信联系。大约半年后,他忽然接到她

① 参见朱鸿召:《延安文人》,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 10月版,第 100页。

② 梅剑主编:《延安秘事》下册,北京 红旗出版社 1995年 10月版,第 100—101页。

的告别信,说组织安排要她陪同一位老干部到晋察冀边区前线。“‘陕公’与安吴堡青训班常有人来往,我得知一些情况,知道我们的关系完了。”^①此事对他打击很大,他感到再也不能待下去了,随即离开延安。半个多世纪过去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和这件事,以为自己“由此而学懂了一点人生的、社会的内核性的东西”,“看到了一个胚胎,一个雏形,由此而领悟了社会的结构和运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然“这点获得极难用文字表述”,但对他自己人生的影响却是至深至远的。“我真切地自我审察到,从此就添加了一些虚无气,对生活的执著也添上了虽然是轻度的怀疑和渺茫的色调。这对我以后的生涯影响极大。我常为克服附在我身上的这个消极性幽灵而付出精力,到底没能尽根制服庄生式的对人生的玩赏态度。”^②幸许怀疑与玩赏的人生中会伴生出几分旷达与超脱,毕竟有违公正,暗影出没,让人耿耿于怀。

二 摇时间与食谱

苑

时间是人类文明的坐标,人们用不同的态度对待时间构成了这个世界不同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时间指纹。认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其实就是去认识它如何使用时间。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时间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统一的过程。

长征过来的革命队伍里,计时的钟表是非常珍贵的稀罕物件,只有战斗指挥员才配有。集体生活作息时间,起床、熄灯、一日三餐都是以号角为指令的。令行禁止,个人无须计时。只有担任首长警卫任务的战士们,需要计时轮换岗位,便以焚香为准,大约一炷香一个小时。而一些学校的作息时间表,干脆以领导者或值勤者观测太阳高低,日暮晨昏为标准,随意性很大。遇到集体活动、庆祝盛典、群众集会,就并无定时,什么时候主持其事的领导人到场,便什么时候宣布开始。这在革命队伍里一般战士或工作人员并不觉得有什么妨碍,相反,领导人没有到场前的时间里正可以互相“拉歌”,热闹一阵子呢。

① 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54页。

② 何满子：《鸣栖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54—155页。

但因为有了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便感觉到了落后和不习惯。曾经留学法国近十年的陈学昭就公开批评延安,“开一次会,要是有几个人的话,等待开会的时间往往可以和开会本身的时间占得差不多,就是说 两小时的会,要等待两小时。听报告也是如此。我的经验是听报告两小时的话,等待了一小时半到两小时,就已经感到疲乏,而不能集中精神去听报告了。”^①也有领导同志偶尔号召大家遵守时间,但大家已经相习成风,没有时间概念,或时间概念淡薄,彼此遵守的只有革命队伍里的号角和领导者的指令。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把自己所有活着的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的革命者,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分子,其一切行动都听指挥。只有那些将自己生命当作个人财富,或者是更广阔的人类财富的知识分子们,才觉得“不重视时间,不遵守时间,不抓紧时间,也就是浪费时间”。

愿



位于南门外新市场附近的南区合作社门市部,是公有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两种对待时间的不同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便产生了心理矛盾和思想冲突。随着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以及医学、通讯等现代科学事业的出现,他们对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时间浪费现象也就意见越大。“在延安我们缺乏足够的钟表。即使有钟表,亦无标准时间,往

^① 陈学昭:《时间》,《解放日报》(延安) 1945年 11月 15日。

往相差到一、二小时,以致开会或听报告总不能按时到齐,前后浪费很多时间。”^①钟表不能普及,那么,最可行的办法是制作沙漏和日晷。

1943年 8月 20日成立的中央医院,采用的是与李鼎铭先生所擅长的中医完全不同的西方医学,诊断、治疗、化验等操作过程都需要精确的时间计量。医院筹办之初,他们在延安城南门外的新市场买到一个旧闹钟,如获至宝。他们在化验室窑顶上悬挂一个大铁圈,由办公室专人负责看着闹钟按时敲点。“于是仿效外洋轮船报时的方法,从晨五时到晚十时,每小时报一次时间,以四小时为一组,一、五、九同样报法,二、四、十也同样报法,使大家心中有数,听者不会误会。”^②不久,宋庆龄托人带来几只手表给中央领导,毛泽东得知医院需要,就全部给了医院,戴在各科室主任手上。但一来僧多粥少,二来坏了没有人维修,所以刘允中医生便制作了沙漏。

从延河边找来细白均匀的沙子,放在细长的中间束身一次只能流通过一粒沙子的玻璃管中,计算出一秒钟流通过的沙子数,装置一定的沙子后,再将玻璃管封闭即可。有 15秒与 30秒两种,使用时可以来回倒两次或四次,便是一分钟的时间。开始在医院里使用,用以计算呼吸,数脉搏。后来大生产运动中,在 1943年 8月 20日的《解放日报》上予以介绍推广。

沙漏适宜于室内精确细小刻度计时,室外大刻度计时是日晷。1943年 8月 20日《解放日报》报道,边区数理学会的孙桐计算太阳与时间的对数,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物理系江天成校审并设计出石质日晷。然后,由自然科学学院、边区政府和延安市政府资助,翻刻制作出两个大的石质日晷,分别安置在自然科学学院内和市南门外新市场沟口。^③在当时条件下,此举堪称是对两种不同时间态度的最佳调和办法。随即,延安的很多单位,如杨家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也都陆续安装了这种形式的计时工具——日晷。

其实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中,尤其是先后从苏联回来的领导

① 江天成:《延安日晷与地方时》,《解放日报》(延安) 1943年 8月 20日。

② 何穆:《延安中央医院是怎样创办起来的》,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年 8月版,第 33页。

③ 当年安置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日晷,1958年 8月为躲避国民党进攻,曾经被埋藏在地下。1983年被重新挖掘起来,并被征集为革命文物,至今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惯和方式使用着时间。

用行政的办法统一了标准的时间,林迈克在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感觉到方便多了。对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一般战士,以及奔赴延安后在整风运动中接受革命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关于时间的概念依然是模糊的。天有阴晴雨雪,石质的日晷岂能承受过多的苛求?在延安革命队伍里,过着供给制集体生活的人们,最严格的时间作息标准,其实是食堂一日三餐或两餐的开饭吆喝声,或梆声,或哨声。

1945年秋,陈学昭以《国讯》旬刊(黄炎培主编)特约记者身份从重庆到延安,刚开始她被安排住在中央交际处招待所。吃饭时间是:

早饭 8时左右,干饭;
午饭 12时左右,稀饭;
晚饭 18时左右,干饭。

原

“三顿饭在六七小时内吃完,只觉得一天工夫吃饭的时间占去大部分,因为饭与饭之间的距离太近,常常把工作打断。三顿饭都是小米,菜呢,都是南瓜。……自从我到后,他们为优待外来的参观者,为了外来的人一下子不能习惯于吃小米、素菜,每次都特地给我烧大米饭,另加一只葱炒蛋。”她写回的报道中记述着:“说到吃,一般人都吃小米,那是外边大家都知道了。在冬天,蔬菜只有白菜、豆腐、豆芽菜、红萝卜、白萝卜、洋芋、粉条,荤菜只有猪肉,及猪身上的一切,羊肉,与鸡、牛肉呢,难得有出售,那是死了的牛的肉。鸡蛋绝对没有,因为天太冷,鸡不下蛋。现在,初春的美丽季候,只有菠菜,白菜绝对没有了,其他菜类与冬季的一样,不过荤菜增加了鸡蛋而已。”^①近代陕北灾荒连年,几万人的革命队伍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了。

延安马列学院坐落在蓝家坪的半山坡上,名曰学院,其实只是几排窑洞,周围没有围墙。每排窑洞前面有一块平坦的空地,可供学员读书、吃饭。四五个学员住一个窑洞,洞内放一条桌,供晚上点灯照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版,请访问: www.ezongbook.com
^①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1946年7月版,第181-182页。

读书用,没有椅子。“学院的生活很有规律,读书、上课、讨论、就餐、睡觉均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以哨为号。学员吃饭一般都到最下面一排窑洞伙房去打饭,一个小组一脸盆菜,大家蜷着腿围坐在地上吃。”^①一位学员于 1938 年 10 月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他回忆当时学员生活待遇是:每人每天 1 斤小米,1 斤青菜,1 钱油,1 钱盐。每年发单棉制服各一套,生活是有保证的。每月还发一点津贴。^②另一位学员于 1938 年 10 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回忆当时的学员生活待遇和伙食情况与上有些出入:“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每日小米(糠不少)1 斤,蔬菜 1 斤,油 1 钱,盐 1 钱。每周一顿二米饭(小米掺杂大米——引者注)或馒头,菜汤上漂几片肉,节日可吃到一顿大米饭。每月零用钱 1 元。”^③

马列学院是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学员们都是将来的干部候选人,言行举止也都比较入规入矩。而另外一所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们,年龄上较马列学院普遍年轻,资历也浅,有的甚至还是十几岁的大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伙食单调,油水不多,遇到每周一次的伙食改善,就会出现很多热闹。

山下的哨子声盖过了乐器声,要开饭了,今天又逢改善生活,同学们放下学习工具,雀跃着跑下山来。炊事员已经把一大饭桶面条抬到广场上,“掐饭,掐饭,吸烟,吸烟”,操着各种强调的语言,身着各种服装的学生,顿时把饭桶围严实了。有一个调皮鬼打着快板,敲着餐具,“‘武’餐呵!”一个鹌鹑翻身挤在最前边,三下两下就捞起一碗面条。后来的不甘示弱,手伸过他的头顶,两条胳膊已经探到饭桶边沿上了,“加油呀!莫后退。”人们拥挤起来,终于把盛起来的那碗面条挤翻,洒在更下边人的头部及肩膀上。这时候四周响起了喝彩声、笑声,尽情的欢腾着。这是独特的景观,没有导演的

① 段苏权:《一生奋进总思源——忆延安马列学院》,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第 104—105 页。

② 郭敬:《马列学院的生产劳动》,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同前引第 105 页。

③ 同②。

节目。^①

此情此景当时热烈紧张,事后令人难忘,思之有趣。据另一位鲁艺同学回忆,平时伙食就是小米干饭,菜是熬萝卜条,偶尔有个菠菜汤。“每星期吃一顿面条,里面掺的猪肉,味道怪鲜的,用大木桶盛的,打饭各人围着木桶去盛,都是青年学生,人挤人抢面条,怕迟了吃不到了。”华君武就此还画过一张漫画,夸张地“只见面条落在有的人的背上、肩上、头发上、耳朵上”^②。漫画张贴出来后,引人捧腹大笑。

1944年大生产运动后,改善了学员的伙食,能够吃上馒头,菜里的肉片也多了。

大生产运动中,各单位多种经营,养猪、种菜,并创收,改善生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原来每天伙食的主食是小米,此时变成面食,并且逐渐地每周还可以吃上一餐大米饭。这是他们一周的食谱:

员表

星期一:

早饭 羊肉炒萝卜、炖牛肉、豆腐、白菜、粉条、西红柿汤;
午饭 面条;
晚饭 素炒青菜、炖白菜、猪肉丸子汤。

星期二:

早饭 羊肉炒土豆、炒菠菜、豆腐汤;
午饭 疙瘩汤;
晚饭 油炸丸子、汤。

星期三:

早饭 猪肉炒白菜、卷心菜汤;
午饭 面条;
晚饭 煎肉丸子、炖南瓜、西红柿汤。

星期四:

早饭 羊肉炒土豆、炒菠菜、豆腐汤;

^① 司汀:《古元——我在延安鲁艺的同学》,见《古元纪念文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15页。

^② 刘蒙天:《回忆古元同志点点滴滴》,见《古元纪念文集》,同前引第15页。

午饭 疙瘩汤；

晚饭 色拉、裹面油炸茄子、卷心菜汤。

星期五：

早饭 牛肉炒白菜、西红柿汤；

午饭 面条；

晚饭 蒸鸡蛋羹、南瓜甘薯泥栗子、萝卜汤。

星期六：

早饭 猪肉炒白菜、白菜豆腐汤；

午饭 疙瘩汤；

晚饭 炖菜、蒸南瓜、醋拌凉菜。^①

员源

该校学员都是日本俘虏，为了体现优待政策，伙食是上乘的。但毕竟大生产运动解决了革命队伍的温饱问题。不久，当地老乡的生活也改善了，街上的饭馆里可以买到大米饭、馒头和面条，以及肉食菜，各机关学校食堂虽然还是以小米为主，但副食品花样多了，一天可以吃上一顿肉。

三摇货币与物价

延安革命队伍里实行供给制，作为一个“公家人”，一般吃住用全部由公家按照不同的级别等差无偿供给，个人需要购买的东西很少，除非私自给自己或邀几个朋友下馆子加餐开荤。但作为一个国家的雏形，延安时期仍然发行货币。市面流通的钱先后有“苏票”、“法币”、“光华券”、“边币”、“流通券”等几种形式。由于有了这些不同的钱币，便带来人们生活中物价的涨与落，以及生活水平的好与孳。

最初红军带到延安的钱是“苏票”，即“苏维埃国币”，又称苏币。早在 员缘年 圆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便创立，苑月 苑日开始发行统一的新纸币“苏维埃国币”，面额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

^① [日] 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北京：长征出版社 员愿年 缘月版，第 缘-缘页。

共缘种。苏票一元与法币一元相等值。“缘缘年缘月红军长征时,毛泽民(时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引者注)奉命携带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缘园多担黄金、白银和苏币,组成特别大队,保证红军给养;同时还兼负管理沿途运输、接收打土豪的财物、筹粮筹款等工作……”^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的名义,继续发行过一些苏票,但流通有限。

缘缘年缘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随之,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也相应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承认并流通法币,逐步收回苏票。

“法币”,是指缘缘年缘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制度,“废两改元”,改用统一的纸币流通,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大银行(缘缘年缘月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共四大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即“法币”。缘缘年缘月,边区银行发行了小面额的“光华商店代价券”,简称“光华券”。



缘缘年缘月缘日,陕甘宁边区银行开业典礼

一年后,国民政府得到报告,大为光火,责令严查。缘缘年缘月苑日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查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惟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环请,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

^① 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缘缘年缘月版,第缘缘页。



图2 1943年光华商店发行的光华券（二分）

图2

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行使情事。尊座听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①

次日，再由边区政府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呈文，重申上述缘由。源月 10 日，边区政府又一次致函国民党西安行营：“查边区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惟于开始推行之期，流通市面之法币，多系五元十元者，而零星辅币，

万分缺乏……农民则因需用品之不易购到，宁愿物物交换，不肯接受法币。”边区银行经托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有关方面交涉，结果由中央银行兑换少量辅币，同时由国民政府支付给八路军的军饷，同意辅币占十分之一。这样，市面上仍然小票太缺，多用邮票找零。于是，便有了“光华券”。

光华商店是由原边区政府贸易局改制而成，归属于边区银行经营管理的当时延安最大的一家商店。“光华券”票面为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共 5 种，作为法币的辅币，开始只发行 100 万元，持券者可以随时到光华商店如数兑换法币，信誉甚好。1943 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受到破坏，国共两党关系大不如前。入冬以后，延安物价猛涨，法币狂跌，陕甘宁边区财政供给出现困难，于是在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同时，为了调剂金融，周转财政，遂扩大光华券的发行，至 1943 年 10 月共计发行 100 万元，至 1944 年 10 月共计发行 1000 万元。1945 年 1 月

① 参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1 辑，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7 年 1 月版，第 100 页。



1945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五元）

月,开始试发行“边币”,并增加发行票面为七角五分的代价券,连同前面发行的五种,光华券共计六种。到1945年10月,共计发行源远源万元,其中边币源远万元。

“边币”是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正式货币。与光华券一样,票面上都标以“中华民国”纪年,但大红着色,妇女纺纱、羊群等图案已经具有鲜明的解放区文化特色。

1945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员

月10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独立发行边区自己的货币,员月10日颁布法令禁止法币在边区范围内流通。10月10日,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票面为一元、五元、十元,与光华代价券辅币配合使用,以后逐渐以边币收回光华代价券。

据时任边区银行行长的南汉宸在1945年10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的报告《财政工作报告》介绍,“政府为了在边区维持法币价格,调剂金融流通,同时为了防止法币对敌占区的流出,今年春天在以现金与法币作基金的条件下,发行了源远源万元的边币,在边区市场以内流通。以边区1000万人口计算,源远源万元的边币,平均每人流通量只有远元(据估计大后方平均在源—源元),这在百物昂贵的今日,绝对不会超过市场的需要,换句话说就是绝对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现象。然而我们毋庸讳言,1945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五千元)



1945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五千元）